

读书的速度

王培军

不久前在微信的朋友圈中，见到有人说起：大概每年所读书的数，可以有多少？换言之，就是我们读书的速度，到底可有多快？凡事总是越快越好的，“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”，读书亦然。要不然，为什么古之才士，总是“读书十行俱下”呢。我联想起前人的文字，亦有议论及此的，不妨稍为摘引，并试加讨论，供学者参考。

近人瞿兑之《柘庐所闻录》“读史”条云：“曾国藩通籍后买《二十三史》一部，自课每日十叶。王闿运亦自课《二十四史》，每日可一本。……读史者宜于诸志观其会通，不应专以记诵人物事实为能，王夫之尝讥陈大士自诩三个月看毕《二十一史》，正谓此也。今人看书已不似古人之拙，能看毕《二十四史》殊不难，然肯用此功者殊不多见。惟新会陈垣曾以一年之力编《四库全书》一过。”

按曾国藩的读史，是“每日十叶”，如果用武英殿本的《史记》计算，按照这个速度，读完一篇《五帝本纪》，也要三天时间！中华书局的点校本，《五帝本纪》共48页，也就是说，他每天只读16页；而整部的点校本《史记》，共有3355页（加上三家注序），他读完此书，那必须210天、7个月！这速度似太慢，虽说是曾国藩的，也不想讨论它了。

那么王闿运呢，他“每日可一本”，此速度又如何？钱锺书的一本，并没有几卷，一部《史记》，有时订成24本，有时是订成28本或30本，相差不大。就是说，王闿运之读《史记》，不过一个月。其他二十四史，据此可推。中华书局的点校本《二十四史》，共241本，《史记》只10本，以王闿运的速度，大约三天读一本，读完《二十四史》，那也要24个月、整2年的时间。这也必须一天不落，是否能够坚持，姑且不论。问题是，对于这个快速度，“不惮于读大书”的张舜徽，却是不以为然的。其《清人笔记条辨》批评云：

“王氏逐日所记，虽有读史之课，然亦粗略观之，不求甚解。尝自述：‘阅《辽史》，全不知其事实。’‘点《元史》九叶，此书必不能多看。每日以九叶计日而已，多看伤神。’……由其所自道者观之，可以知其读史之功，本甚草率也。”“王氏自负才大，读书不耐仔细，大抵翻阅为多，粗加涉猎而已。尝自记：‘翻《通鉴》九本。十函毕，翻一过矣。《通鉴》曾未点群史时，讶其浩博，今日重翻。’又记：‘夜补看《唐文》八本，未甚细读。’又记：‘看《墨子》一过，未能子细。’如此读书，岂能真有所得？徒以清略成习，而不耐爬梳纷杂，故于难理之大书，无能役也。”（卷九）

据《湘绮楼日记》，王闿运读《二十四史》花了26年的时间，也并非没有毕业（见光绪十六年三月廿八日记）。这固是“作辍不恒”，有以致之，也见得读《二十四史》，不那么容易成功。

至于那位“横看书”的陈大士（其人名际泰，是晚明的有数的八股文大作家；其读《廿一史》事，见张采《知民堂文存》卷二《陈大士集序》：“大士点次《二十一史》，不逾三月，人疑其略，则应曰：‘第简漏否？诸君自钝，我横看尔。’”），他的读书速度，自又快

速于王闿运。“三个月”是90天，“廿一史”不包括《明史》、《旧五代史》及《旧唐书》，点校本的本数，是共191本，也就是说，他每天读2.1本。这比王闿运的每天0.33本，又快了6.4倍！所以读书不太博而为王闿运不佩服的王夫之，便不很服气了，在《夕堂永日绪论外编》中作论云：

“陈大士自云三月而遍读廿一史，目力之胜可知。……大士以博敏自雄，故乱道。以此推之，大士于史，凡地理、职官、兵刑、赋役等志，俱不蒙其呵睐。若但取列传草草看过，于可喜可恨事，或为击节，或为按剑，则一部《风洲纲鉴》足矣，何必九十日功夫，繙此充栋册子邪。”（《船山全书》第十五册，865页）

这一节论，固是“箭不虚发”，中到了其痛处，却不免颇有酸意。其实呢，就算陈大士三个月看毕《廿一史》，又在近代的学者，要亦为有数之人。他不是说过：“余父子集部之学，当继嘉定钱氏（大昕）之史学以后先照映，非夸语也。”其自信可想。张舜徽《壮行轩日记》1943年1月1日记之云：“至钱子泉处稍坐，先生自言居湘四载，读书三千六百册，亦云富矣。”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50页）张舜徽虽不服王闿运，“嗔有烦言”，但于钱基博是认可的。钱基博本人的《金玉缘谱》亦书此事云：“吾虽老病，未尝一日废书；而湘湘三年，读书三千六百册，提要钩玄，皆有日记。”（傅宏星编《精忠柏石室教育文选》，203页）所言差一年，以致稍确算之，有一些困难，但他的读书速度，是不容怀疑的。

这里另有一件事，必须提出，那就是：钱基博在三十六岁时，读书的总量，还只是三千册。这是见于其《国学必读序言》的：“余文质无底，然自计六岁授书，迄今三十年，所读巨细字书，亡虑三千册；四书五经之外，其中多有四五过者；少亦一再过；提要钩元，厘乃得此。”（见《国学必读》卷首）

此序作于民国十二年二月十八日，即1923年，那时他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，年三十六岁。他之居湘，执教蓝田国立师范学院，——也就是《围城》所影射的“三闾大学”——是

在1938年的年底，至1943年年初，他是已经“居湘四载”；而《金玉缘谱》之作，是在1942年，说“来湘三年”，也是不算错的。那时他57岁，“人学俱老”了。这里的问题是：他此前的三十年，只读了三千册，而来湘后的三年（或四年），却又忽然读了三千六百册。其前后之速度，何乃相悬若是？因为一般而言，一个人的读书速度，是必较为恒定的，即有所变化，也必相差无多。又据他的著作观之，也不像那么的博览，这当然也许只是因为他不长于贯穿，而只能“提要钩元”之故。无论如何，老钱先生的读书日记已毁，我们对此已无法深论，所以于老先生的自述，只能姑妄听之。

有日记可资讨论的，可以举文廷式。文廷式是晚清最博学的人之一，也许仅次于沈曾植，他的读书速度，那当然是必须快的。文廷式有一卷《丙子（1876）日记》，记他21岁这年的春夏所读之书，具体的日期，是从正月初一始，至闰五月初二日，为时5个月、150余日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所读大书为：《隋书》85卷，《明史》332卷，《元史》210卷，《金史》135卷，《旧五代史》150卷，共5种912卷。此外所读的杂书，还另有《通典》、《日知录》、《南汉春秋》、《大清会典》、《海国图志》、《蕉轩随录》、《禹贡图说》、《四库提要》、《文选》、《论语注疏》、《史通通释》、《国朝先正事略》、《十国春秋》、《鮑塘亭外集》等，各尽十餘卷或数卷不等，虽多未终卷，而加起来，却也不下于百卷。也就是说，在此五个月中，文廷式所读的书，共达千卷之多。这还不算他于正月二十七日作的十首、二十八日作的四十首、二十九日又作的二十八首的《三国志小乐府》，诸如此类。他的精力之盛，确实是惊人的。但他每日的读书，有时多、有时少，并不是很统一，多者如正月十八日：“点《隋书》十四卷。”二月二十一日：“读《元史》一卷、《明史》十七卷、《论语》三章。阅《史通通释》一卷。”三十日：“读《明史》十三卷。阅赵陞北《廿二史劄记》数十页。”三月二十二日、二十三日，各读《明史》十五卷、十六卷。四月初九：“读《元史》十五卷。”十六日：“读《元史》二十卷。”二十二日：“阅《金史》十四卷。”五月二十三日：“读《旧五代史》二十卷。”二十四日、二十五日，各读十八卷。二十九日：“阅《五代史》二十卷。”闰五月初一：“阅《五代史》二十五卷。”读得最多的，是

二月十九日：“读《明史》四十一卷、《通典》二卷。”其次为五月三十日的：“阅《五代史》三十五卷。”一般的日子，则是日读五六卷。

看了这个，近人袁昶所说的：“全榭山与晓岚学士约共读《永乐大全（典）》，日尽二十本，可畏可畏。”（《袁昶日记》上册112页。按，《永乐大典》的每本卷数，一般为2卷，但亦有每本1卷、3卷的，并不一定；其原本为11095本、22937卷，至四库开馆，已颇有缺佚，所存共9671本、20663卷，据此以算之，平均1本可2.14卷，20本也就是42.7卷，比文廷式读的最多的43卷，尚有所不及）就没多么了不起了。康有为之为人说法：“‘廿四史’宜全读，新学读史，日一二卷，其后渐习，日可三四卷。……是一年半，可读十九史。其《宋》、《辽》、《金》、《元》、《明史》，一年半年，无不阅遍。此皆为中人之资言之，计日程功，无不可至。若异敏之士，尚不待此。即资质稍鲁者，加倍其日，亦三年可通全史矣。”又：“诸子一二月可毕”，《国策》、《逸周书》、《水经注》等，“十数日可毕”；《资治通鉴》、《续通鉴》及《纪事本末》等五书，亦“数月可毕”。也只好算作“小巫见大巫”了。而著了《桐城文学渊源考》、《撰述考》闻名的刘声木，却论为：“姑无论其言之是否，此等自欺欺人之说，竟出自坐拥皋比，手执教鞭之口，试问古今天下读书，有如此容易者乎？”（见《荏楚斋随笔》四笔卷五“论《桂学答问》”条）是不免有些“少见多怪”的。而曹聚仁《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》所自夸的：“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，先先后后总读了一百多遍。我看《红楼梦》，不如俞平伯师那么多，只有七十多遍。《水浒传》呢，我只看了二十多遍。……《三国演义》，我只看了二三遍，觉得大不如陈寿《三国志》的引人入胜。说来，也许朋友们不相信，我把《资治通鉴》‘正续’读了两遍半，当然比不上顾颉刚先生。文言文小说，蒲松龄的《聊斋》，我读了四五十遍。”（381页，三联书店版）真的是“浅陋可悯”！我们简直想问：这种白话小说，你读它个数十百遍，“占毕啾啾”，又有什么意思？

不过，一般的读书速度，也用不到多么快，就以《史记》、《左传》为例，陈垣说的：“《史记》著成已二千年，前人要三个月读完，我们今日仍要三个月才能读完。”（见《中国史料的整理》，《陈垣全集》第七册457页）以及：“念《左传》不易，须一年多才能背，才知出处。”（见《史学论学及清代史学考论》23页。又据宋人的统计，《左传》虽是“大经”，也只196845字；若每日背539字，则一年可毕）这也就够了，这也就是标准的速度，而陈氏本人的读书速度，自亦不过如此。考虑陈垣为近代屈指可数的大史学家，又是从头繙过36277册、2291100页的《四库全书》的人，假如我们的读书，不慢于他的速度，那也就大可不必“捉急”了。

陶渊明去世后不久，颜延之撰《陶徵士诔》以表彰其嘉言懿行，意味深长地提到“黔娄既没，展禽亦逝”。将亡友比作黔娄还比较容易理解，陶渊明在《咏贫士》其四开篇就说：“安贫守贱者，自古有黔娄。”对其持节固穷推崇备至；在《五柳先生传》篇末赞语中也说：“黔娄有言：‘不戚戚于贫贱，不汲汲于富贵。’”从沈约《宋书》、萧统《陶渊明传》开始，就都认为渊明“尝著《五柳先生传》以自况”。尽管不能草率地将此等同于陶氏自传，但黔娄的简介不苟显然激起了他的强烈共鸣。将他们相提并论，自是顺理成章。不过与此同时，颜延之又将渊明和展禽等量齐观，就让人略感困惑费解。

这篇诔文稍后被梁昭明太子萧统选入《文选》，唐善善注仅指出展禽即春秋时鲁国大夫柳下惠，并未再予深究。柳下惠在后世虽以“坐怀不乱”而著称，但颜氏取意显然并不在此。寻绎早期文献中有关柳下惠的零星记载，其言行几乎都与政事息息相关。然而在他称道他能以直道事人之时，各家也多存不嫌于心之意，甚至无不惋惜同情。比如在《论语·微子》篇中开列过一份“逸民”名单，还引述了孔子的一份评论：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齐与？”“柳下惠、少连，降志辱身矣；言中伦，行中虑，其斯而已矣。”比起卓立不羁的伯夷、叔齐来，柳下惠等人只能采取自贱自污的方式来待人处世，尽管其言谈举止尚能恪守法度并预先筹划周详，但也仅此而已。孟子虽将伯夷和柳下惠并称为“百世之师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，不过细究起来，两人还是大有分别。伯夷“非其君不事，非其友不友”，很有兀傲旷达而清介自守的气概，柳下惠却“不羞污君，不卑小官”（《公孙丑上》），不免有些低声下气地与世俗俯仰的窘迫。正因如此，扬雄《法言·渊骞》在提到诸如柳下惠这样避世于庙堂之上的“朝隐者”时，就直截了当地批评道：“古者高饿隐，下禄隐。”意即自古以来人们都尊崇安于穷困而声名显扬之辈，鄙薄贪求禄位却标榜隐逸之徒。近人汪荣宝《法言义疏》认为扬雄之意，“言虽柳下惠，亦非君子所当取法者也”，可谓深得其旨。

后人追慕陶渊明的高情逸致，很容易联想起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（《饮酒》其五）的超然洒脱；即便涉及他归隐前的仕宦经历，也大抵聚焦于“在官八十日”（《归去来兮辞》）的彭泽令任上，容易被“我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”（《宋书·本传》）的豪言所吸引。由于历代层累造成的印象，他俨然已经成为隐逸不仕、孤高特立的代名词。以此反观陶渊明曾先后替桓玄和刘裕这两位篡晋自立的“乱臣贼子”效力的事实，不过陶渊明本人对这两段经历并不讳言，在桓玄手下任职时写有《庚子岁五月中赴都还阻风于楫林》（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），既眷恋家居生活的悠游自在，“静念园林好，人间良可辞”，又悲叹仕宦生涯的艰辛劳苦，“怀役不遑寐，中宵尚孤征”；随后转投刘裕麾下，又有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，同样感慨“目倦川涂异，心念山泽远。望云惭高鸟，临水愧游鱼”。当最朴素最平实的祈盼都无法实现时，种种悔恨、苦闷、失落、迷惘便交织成执拗而强大的力量，又不得不在直面琐屑庸碌的现实时，又不得不依违彷徨而虚与委蛇，竭力抑制这种情感的自然流露。这样的委曲求全以至隐忍苟且，也确实和柳下惠“不羞污君，不卑小官”的表现相似。

陶渊明在诗文中也曾提及柳下惠，只是不够直白显豁，很容易被人忽略罢了。比如《饮酒》其十八云：“有时不肯言，岂不在伐国？仁者用其心，何尝失显默。”前人早已指出，前两句语本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，谓鲁国国君准备讨伐齐国，事先曾向柳下惠征求意见。柳下惠在劝阻之后，“归而有忧色曰：‘吾闻伐国不问仁人，此言何为而至我哉？’”扪心自问，颇多自责。而从后两句看，渊明仍然称许柳下惠为“仁者”，很能设身处地体谅其处境之艰难不易。清人陶澍注《靖节先生集》认为这正反映出渊明对柳下惠仰慕，也体现了他“和光同尘”“道合中庸”的处世之道。更值得注意的则是《五柳先生传》，文章开头就耐人寻味地说：“先生不知何许人也，亦不详其姓名，宅边有五柳树，因为号焉。”而据许慎《淮南子注》云，“展禽之家树柳，行惠德，因号柳下惠”（《艺文类聚》卷八十九引）；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高诱注也说，柳下惠“家有大大柳树，惠德，因号柳下惠”，展禽得名柳下惠的缘故，竟然也与此相同。陶渊明在运思落笔之际，或许即受此启发而涉笔成趣。

颜延之在诔文中回忆道：“自尔介居，及我多暇。伊好之洽，接闾邻舍。”《宋书》也说：“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，在寻阳与潜情款，后为始安郡，经过，日造潜。”可知两人过从频密已在渊明归隐田园之后。尽管就双方当时的身份而言，一官一隐，差异悬殊，但并不影响两人的交谊。从“展禽亦逝”的评价中，更足见两人的相知相契。颜延之在撰写诔文时虽不便直书其事，但也能抛却俗套，不为虚美，借此发遣亡友的心曲隐衷。而依然在宦途上奔波劳顿的他，对柳下惠和陶渊明所承受过的漫长而痛苦的挣扎和煎熬，应该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陶渊明与柳下惠

杨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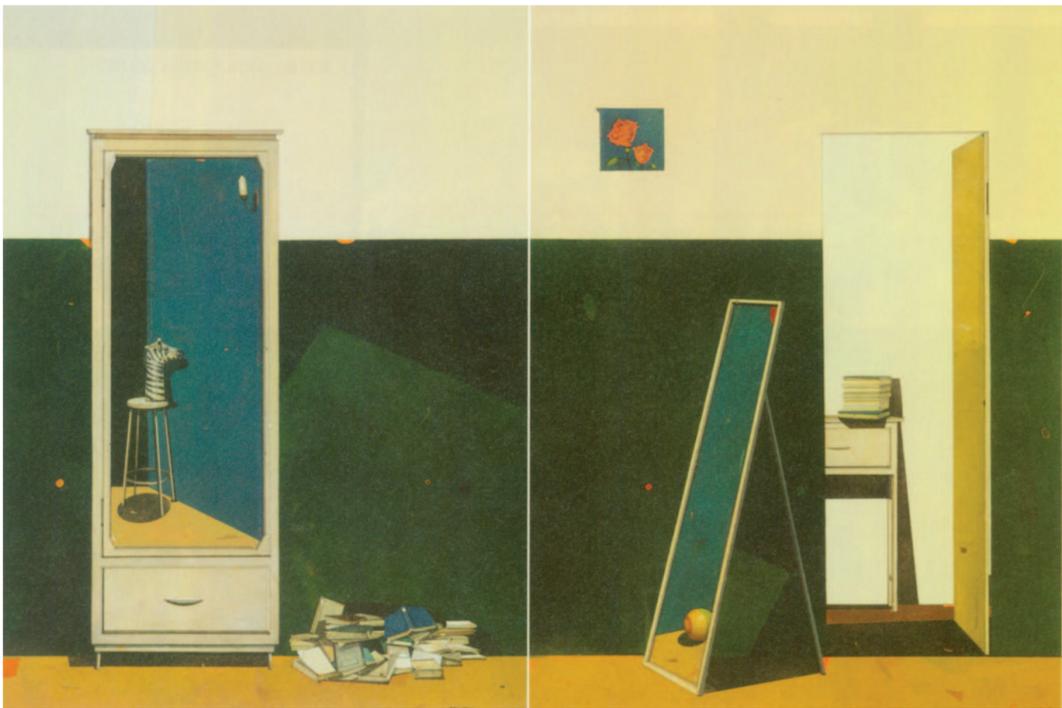
他其实有过多次反复，时仕时隐，犹疑未决，前后至少有十年之久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“镇军参军”一职，本是“镇军将军参军”的省称，历代研究者多认为“镇军将军”即当时北府军的统帅刘裕。另据后人钩沉索隐，在出任镇军将军参军以前，他还有两三年左右在权臣桓玄手下充当过僚佐。而无论桓玄还是刘裕，都是东晋末年呼风唤雨、颠倒乾坤的威权人物。桓玄自恃功高，曾废黜晋安帝而自称皇帝，刘裕旋即起兵征讨。其后桓玄兵败伏诛，刘裕趁机独揽朝政，最终假托禅让而代晋建宋。这一系列瞬息万变、波谲云诡的政局变幻，陶渊明非但亲历，还极有可能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其中。

在后世绝大部分评论家看来，陶渊明在政治上爱憎分明而立场坚定，甚至认定陶诗“晋时所作者皆题年号，人宋所作者但题甲子而已。意者耻事二姓，故以异之”（《文选》卷二十六《陶渊明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》五臣刘良注），毋庸赘言很难接受陶渊明曾先后替桓玄和刘裕这两位篡晋自立的“乱臣贼子”效力的事实。不过陶渊明本人对这两段经历并不讳言，在桓玄手下任职时写有《庚子岁五月中赴都还阻风于楫林》（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），既眷恋家居生活的悠游自在，“静念园林好，人间良可辞”，又悲叹仕宦生涯的艰辛劳苦，“怀役不遑寐，中宵尚孤征”；随后转投刘裕麾下，又有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，同样感慨“目倦川涂异，心念山泽远。望云惭高鸟，临水愧游鱼”。当最朴素最平实的祈盼都无法实现时，种种悔恨、苦闷、失落、迷惘便交织成执拗而强大的力量，又不得不在直面琐屑庸碌的现实时，又不得不依违彷徨而虚与委蛇，竭力抑制这种情感的自然流露。这样的委曲求全以至隐忍苟且，也确实和柳下惠“不羞污君，不卑小官”的表现相似。

陶渊明在诗文中也曾提及柳下惠，只是不够直白显豁，很容易被人忽略罢了。比如《饮酒》其十八云：“有时不肯言，岂不在伐国？仁者用其心，何尝失显默。”前人早已指出，前两句语本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，谓鲁国国君准备讨伐齐国，事先曾向柳下惠征求意见。柳下惠在劝阻之后，“归而有忧色曰：‘吾闻伐国不问仁人，此言何为而至我哉？’”扪心自问，颇多自责。而从后两句看，渊明仍然称许柳下惠为“仁者”，很能设身处地体谅其处境之艰难不易。清人陶澍注《靖节先生集》认为这正反映出渊明对柳下惠仰慕，也体现了他“和光同尘”“道合中庸”的处世之道。更值得注意的则是《五柳先生传》，文章开头就耐人寻味地说：“先生不知何许人也，亦不详其姓名，宅边有五柳树，因为号焉。”而据许慎《淮南子注》云，“展禽之家树柳，行惠德，因号柳下惠”（《艺文类聚》卷八十九引）；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高诱注也说，柳下惠“家有大大柳树，惠德，因号柳下惠”，展禽得名柳下惠的缘故，竟然也与此相同。陶渊明在运思落笔之际，或许即受此启发而涉笔成趣。

颜延之在诔文中回忆道：“自尔介居，及我多暇。伊好之洽，接闾邻舍。”《宋书》也说：“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，在寻阳与潜情款，后为始安郡，经过，日造潜。”可知两人过从频密已在渊明归隐田园之后。尽管就双方当时的身份而言，一官一隐，差异悬殊，但并不影响两人的交谊。从“展禽亦逝”的评价中，更足见两人的相知相契。颜延之在撰写诔文时虽不便直书其事，但也能抛却俗套，不为虚美，借此发遣亡友的心曲隐衷。而依然在宦途上奔波劳顿的他，对柳下惠和陶渊明所承受过的漫长而痛苦的挣扎和煎熬，应该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笔会



花、镜像和书
(水彩画)
邓涌

“文汇笔会”
微信二维码

笔记小说《子不语》一书曾经很有名（清人袁枚著），其中所记固然以非理性的“怪力乱神”为主，但也有真实的故事。这些记事读来往往更有趣味，试举三则来看。

乾隆辛酉秋，海风拔木，海滨人见龙斗空中，广陵城内外，风过处，民间窗榻、帘箔及所晒衣物吹上半空。有宴客者，八盘十六碟随风而去，少顷，落于数十里外李姓家，肴果摆设丝毫不动。尤奇者，南街上“清白流芳”牌楼之左，一妇人沐浴后簪花髻粉，抱一孩移一竹榻坐于门外，被风吹起，冉冉而升，万目观望，如虎丘泥偶一座，少顷没入云中。明日，妇人至自邵伯镇，镇去城四十余里，安然无恙。云：“初上时，耳听风响，甚怕。愈上愈凉爽，俯视城市，但见云雾，不知高低。落地时，亦徐徐而坠，稳如乘舆，但心中茫然耳。”（卷十一《龙阵风》）

《子不语》中的“据实书之”

顾农

按龙阵风现在称为龙卷风，威力极大，很难预测，也无从预防。辛酉是乾隆六年（1741），这一次扬州一带发生的龙卷风似乎相对温和。袁枚当时记录了这一条新闻，很值得感谢，应记入有关的气象大事记。

南阳县有杨二相公者，精于拳勇……率其徒行教常州。每至演武场传授枪棒，观者如堵。忽一日，有卖蒜叟，龙钟伛偻，咳嗽不绝声，旁睨而揶揄之。众大骇，走告杨。杨大怒，召

至前，以拳打砖墙，陷入尺许，傲之曰：“叟能如是乎？”叟曰：“君能打墙，不能打人。”杨愈怒，骂曰：“老奴能受我打乎？打死勿怨。”叟笑曰：“老人垂死之年，能以一死成君之名，死亦何怨？”乃广约众人，立誓戮之。令杨养息三日。老人自缚于树，解衣露腹。杨故取势于十步外，奋拳击之。老人寂然无声，但见杨双膝跪地，叩头曰：“晚生知罪了！”拔其蒜，已夹入老人腹中，坚不可出。哀求良久，老人鼓腹纵之，已跌出一石桥外矣。

老人徐徐负蒜而归，卒不肯告人姓氏。（卷十四《卖蒜叟》）

按民间自有高人，而特别高的高人往往不露真相，亦不求名，甚且有意隐姓埋名。而凡是气势汹汹、不可一世之輩，虽然大抵也有些本事，总归比较有限，他自我膨胀之后，很容易栽跟头，出洋相，杨二相公即此类之人也。

李刚主讲正心诚意之学。有日记一部，必据实书之。每与其妻交媾，

必书某月某日与老妻敦伦一次。（卷二十一《敦伦》）

按这位李刚主（即略早于袁枚的清代思想家李塨，1659~1733）确为实话实说的君子。袁枚在《答杨笠湖书》中也说到此事，略云“李刚主自负不欺之学。日记云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，至今传为笑谈。”鲁迅在文章中用过李氏“敦伦”（使伦理关系更加笃实，这里指性交）这个比较罕见的典故，说是“时而‘敦伦’者不失为圣贤”（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病后杂谈》）。《鲁迅全集》为此出注，引出《答杨笠湖书》，这是很好的，或不如径引《子不语》的这则记事更为切近。盖袁枚这部小说的影响远大于他的书信，而鲁迅是研究过《子不语》的，评为“其文屏去雕饰，反近自然，然过于率意，亦多芜秽，自题‘戏编’，得其实矣。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·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》）